

問學齊魯、結緣海岱 ——參加山東營的幾點感受

顧成瑞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自第一屆以巴蜀文化為題舉辦以來已走過六年的歷程。這期間，我數次報名，或是眷慕晉城，或是流連江南，有執著的“投奔”熱情。雖然未能如願入選，但是從先後參加四期研習營的同班同學那裡探聽了“內幕”。從他們那裡，我不僅知曉主辦方對學員生活起居的“高規格配置”，還瞭解到李孝悌老師在領導學術活動方面的熱忱和王鴻泰老師組織學員發問的促力。終於，今年自己被研習營錄取了。這樣的感覺像是高中科第。我抱著新奇和激動的心情來到濟南，收穫了處理地域社會的研究方法，懷著滿滿的興致離去。以下就我本次所收穫的長時段的齊魯文化感知和研習營教給我的學習方法談一些感受，不當之處，敬請師友指教。

本次研習營以“齊魯文化”為題，實際上是針對現今山東省內的區域歷史文化。齊文化和魯文化是山東境內的兩種主要文化類型。周初分封時，太公就齊地、周公就魯地，齊國的治理是因俗施政，魯國則是變更其俗。齊地近海，有魚鹽之利，族群很早就擁有航海知識，有對海外仙山、奇事的種種傳說，滋養了陰陽家和早期道教。魯地則接受了周的禮樂文明，後由孔子及其弟子創立和弘揚了儒家學說。不少師友提示我們，要注意齊魯文化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兩種差異很大的文化形態。顯然，今天的山東境內的文化並非齊、魯兩種文化所能概括。比如，今天的魯西北，如臨清、聊城等，與冀南、豫東北等在歷史上應是一個區域，或稱為中古時期的“山東”。為中古史研究者所津津樂道的山東四姓崔、盧、李、鄭，其中就有清河郡的崔氏，這裡的清河郡就包含了我們所知的臨清地域。齊、魯也並非截然對立，沒有交融，秦漢之際的齊地儒生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說明。前揭師友的指正，卻是明白地告訴我們要清楚山東境內的歷史多樣性和文化差異性。山東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恰處於關中平原和華北平原這塊傳統國家前期主要農耕區中軸線上，又是溝通南北的大運河中間部位。有人對中國歷史做過宏觀分析，傳統前期是關中和關東關係為主，後期是北方和南方聯繫為主。兩個階段中，山東都有其重要的角色。我們從專家的授課和實地參訪對這種重要性進行感知，並透過山東歷史文化窺視了中國歷史不同時期的脈動和其中繁複性。

從時間序列上來說，在滿天星斗的中國史前文明中，山東地區以大汶口文化

和龍山文化的廣泛分佈而聞名。方輝教授對魯東南沿海聚落的功能分析，讓我們知曉這一沿海地帶擁有較高文明程度的方國時代到來較早。此地的先民掌握了煮鹽和鑄造技術。而通過鹽，本地或許可以與較遠的聚落發生聯繫。在山大博物館的參觀，我們對於這一時期龍山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感知。進入王朝時期，按照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山東剛好是輪替主政的東夷基地，我們從出土的青銅器上能夠獲取其地文明進程的若干訊息。春秋戰國時期齊魯之地，出現了眾多學派和代表性的學者，我們所熟知的稷下學宮網羅眾家的局面形成就是最好的印證。而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在當時只是其中一家，其在將來的勝出則是政治力量的推動，這方面黃進興先生的講授是精審的揭示。兗州曲阜成了儒教國家的聖城，是歷代統治者巡行山東的必經地。另一個重要的巡幸地——泰山的神話和信仰，在先秦時也悄然發生。秦始皇在一統六國後對泰山的首次封禪，便是接受齊地儒生的鼓動。在他們知識體系裡，黃帝以上的上古帝王已有數次封禪。而泰山雄踞五嶽之首的地位造就，也應包含齊地儒生的種種辛勞。此外，秦始皇接受了仙山神話，派人從山東半島出發赴海外求仙；使用了起源本地的五行學術對國家禮樂制度進行規範。漢承秦制，除了五行、封禪制度之外，我們在史籍中能見到齊地方士和受方士影響的儒生在漢代朝廷的種種活動。根植于魯地的儒學學說經過齊魯儒生的傳承不輟，最終被帝王確定為正統學說，這更體現了本地文化對國家建置的影響。本區域在此時也不斷接受外來文明影響。邢義田教授有關山東青州西辛戰國墓和章丘洛莊漢墓出土器物有外來風格的解讀，告訴我們西方世界的裝飾母體如何傳入中原，被中原工匠仿製，然後再由中原流動北亞草原。顏娟英老師對北朝青州佛教造像的風格分析，更能以青州所處南北要衝、出海通道的位置解讀其風格來源。此外，魏晉南北朝以來，胡人南下，山東士族的建構和擁有胡人特點的山東豪傑在隋唐易代之際的作用，雖然本次研習營沒有直接涉及，但是也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天師道與濱海地區關係，由於陳寅恪先生髮覆而被學界所重視，無須贅言。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後期地處魯西北的博州與相鄰的魏州為軸心的魏博藩鎮成為半獨立于長安朝廷的力量，文物制度和風俗形成了有別於以往和京畿地區的特徵。我在聊城博物館注意到對於位於聊城莘縣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家族墓地的介紹。從圖片上看，數米之高的神道碑顯是“僭越”之證，昭示了其半獨立的政治特色。五代王朝逐漸收服河北藩鎮，河北地區的文臣、武將在五代宋初佔有重要位置，將若干地方性制度文物輸入位於開封的朝廷。

中古以降，山東地區由於海運和漕運興起有了經濟社會史上的重要地位。陳尚勝先生有關登州和山東地區在唐後期由於地方勢力支持成為海外貿易據點和基地講述，展開了一個不同於朝貢貿易論述的歷史面相，這也是隋唐時代登州和山

東半島在東亞世界交往中特殊地位的體現。隋代鑿通大運河，唐宋繼之使用，當時最重要的運段是汴路，這實際上與山東地區的關聯不大。到了元代定都大都，為了將江南的漕米運往京師在山東境內開鑿會通河，連接汶河、衛河等河道，山東在漕運上的地位才得以體現。運河山東段的特殊性在於當地水量不足，水系複雜、與黃河交匯時的危險等等，這給維護運輸帶來很高的難度。我們在對聊城的運河博物館參訪中獲知設置水閘調整水位、開挖湖渠蓄水和築壩人力拖曳運船等種種辦法。或許有人會發出既然漕運維護如此浩繁，何不使用海運代替的疑問。實際上，這涉及到運河運轉不止是漕糧輸送的目的，還有商業運輸和區域貿易功效。我們從臨清鈔關所收船鈔和商稅在明清雄踞運河各鈔關之首，中央和地方官府、內廷和外朝相繼插手臨清鈔關事務都能看到商業繁榮帶來的收益對帝國的意義。商業繁榮的表徵是人口流動和外地商幫聚集。臨清考察中我們看到沿河的清真寺、龍頭磯所存明代墓誌銘講述家族遷移本地的經歷和明清臨清地圖所見的大王廟、天妃宮等分佈，無一不體現外來人口眾多的特點。聊城山陝會館戲臺和關帝信仰，是晉商在運河邊移植山西文化。修築碑銘上眾多商號、經營物品與外地店鋪的記載體現了經營票號、皮毛、文房、海味等眾多行業和構建從外蒙到內蒙、山西、河北、河南至山東商路的商幫勢力。鄭先生有關《金瓶梅》所反映的服飾和飲食文化的講述，讓我們一個以臨清為故事發生地點的商人家庭消費品繁複和長距離來源。閱讀文獻中其他明清小說有關臨清鈔關和在此地經商的記載，更是生動記載了運河帶來的商業繁榮。總之，運河讓沿線的臨清、聊城等地與全國的經濟脈動聯繫起來。

與運河沿岸的繁榮相伴的是民眾泰山信仰的興盛。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是明代前中期擴散起來的。它的出現是民眾和官方共同致力的結果。作為官方祀典中的東嶽，長期以來被民眾看作主管地獄的神祇。但這一觀念後來又轉移到蒿裡、豐都。至此，信眾將碧霞元君與傳統思想中主生的東方青帝聯繫起來，賦予元君主管生育的職能。泰山在史上的數次封禪積累的神聖性加強了這一信仰的力量。尤其是宋真宗東封時，曾對所謂的泰山玉女有恩典。在碧霞元君信仰的官方和士人認可中，這被看作一層重要的聯繫。明代弘治、嘉靖和萬曆時期官方對廟宇修繕和為皇室求子的活動，為其信仰合法性提供了絕好機會。同時，官方通過香稅征斂也獲得了切實的經濟利益。清代乾隆南巡時，曾親自參拜泰山碧霞元君。以此，碧霞元君在北方地區民眾信仰世界中的主神位置穩固了。除了乞福的民間信仰之外，李孝悌老師從社會史的角度引出對明代以來魯西地區的羅教信仰傳播及其與民變關係。趙衛東老師對明清山東地區全真教譜系清理和劉家峰老師對清末民國以來基督教在山東半島和魯西地區傳播和影響比較，為我們繪出了近世山東

地區宗教信仰的複雜圖景。

在傳統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處於傳統核心區域的山東地區自不例外。劉家峰老師談基督教創辦的登州文會館在山東近代教育、文化的轉型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樣是談山東近代化的題目，王德威老師則選取了四位年代承接的山東籍貫作家姜貴、朱西寧、張煒和莫言，分析他們作品所反映的時代訊息。特別有印象的是朱西寧的《鐵漿》反映晚清處於運河沿線的濟寧裡的兩個家族領袖以自殘的方式爭奪漕運權，最後犧牲自我而勝出的一方，只享受數年運河利益就隨著京浦鐵路的通車而沒落。有著憨野風氣的魯西人民在近代交通方式來臨時表現出極大的衝突和痛苦，這是很生動的。黃進興老師所談的近代儒教運動超出了山東範圍，是一個國家轉型所面臨的問題。

以上數段是就本次研習營帶給我們學習、討論各議題的回顧，以下就研習方式給我的啟發談少許體會。

其一，重視文獻閱讀和實地考察的結合。歷史學研究歷來重視對文獻搜集、整理和細讀。傳統的做法是坐在書齋中閱讀。對於前輩有不少豐富生活經歷的人來說，這樣的閱讀方式或許還可以進入歷史語境中。然而，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和生活重心的轉移，越來越多史學工作者有著對傳統的種種疏離，以至於僅憑室內工作，很難回復到相應的歷史場景而讀懂文獻。學科析分和研究專題化，讓不少研習者忽視了各歷史要素之間的關聯，難以對歷史現象做出系統解釋。實地考察則提供了解決以上弊端的機會。例如，今天的泰山天街在樣態和功能上與明清時期差別不大，我們一路經過，感受長期以來朝聖者和觀光者的旅途心態；看到對於碧霞元君祠空間安排，走在進香者之列，去貼近信仰活動。廟宇裡的塑像、碑銘，都是構成信仰空間的重要物件。因此，我們實地讀碑文與原在圖書館中讀碑文所能想到的問題必然不一樣。又如，我們考察了臨清的會通河和衛河河段，通過文學作品的閱讀我們也獲知臨清商貿外來人口多的情況，而或許有一種不過癮的感覺。當我們再看了臨清清真寺和鼇頭磯中的墓誌銘，我們有了更具體、實在的論斷。再如，我們重返歷史現場，將被編纂者打散的碑石文獻，放在它應放的位置，再進行細緻閱讀，對於歷史事實生成的邏輯有更明曉的揭示。當然，文獻和田野的結合，不是只重田野而輕文獻，而是在對文獻細讀基礎上的田野工作，二者都是重要的。否則，文獻準備不足，面對考察物件會有措不及手或者缺乏問題意識的局面。

其二，拋棄學科畛域，會通多方面知識，解決學術問題。歷史現象的造就往往是多重力量通過不同機制作用的結果。而當代學科的分工，卻讓不少研究者只

重視從自身熟悉的方面入手分析問題。這樣無疑就出現了單線的解釋和對研究物件興趣的日益喪失。這方面，李孝悌老師提示我們在看待近世魯西民變的問題上，既要看到羅教教義、組織機制和傳播地域，又要看到自然環境變化和外來文明衝突。邢義田老師對考古圖像的分析，啟示我們盡可能將研究視線從傳統中原拉到草原，溝通東方和西方。無疑這需要豐沛的學識，我輩學子在此以此種為學之法為導，日聚其功，勉力為之而已。研習營對學員的挑選機制就為這種多學科交匯創造了機會。學員中有考古學、藝術史、歷史地理學、宗教史等學科，文獻和理論來源上，有來自歐美世界、有東亞日韓，這就為討論學習創造了很好的機會。我記得在岱廟天貺殿的參訪中，面對解說者對壁畫為宋代所繪的講解時，李孝悌老師敏銳地提出自己的質疑。有藝術史背景的李鈞指出畫面呈現的平行透視技法昭示了它是清代以來的作品。至此，解說者補充說原繪于宋代，後來經過多次描補。

其三，對於王朝制度細緻掌握和大歷史的感知。載之詔令、典章的王朝制度在不同地區實施會有種種差異，就其立法精神而言是一慣的，因此，我們在進入具體區域研究前需要王朝制度的知識儲備。這方面我從張侃老師對臨清移民墓誌的解讀上有很大的啟發。他對墓誌上的衛所、軍籍的解讀立足於對於明代軍衛制度的詳細掌握，同樣的情況放在光岳樓和張秋鎮的分析上。對具體歷史資訊的捕捉，同樣需要對大歷史背景的把握。李孝悌老師、王鴻泰老師對於聊城明清科舉成功的分析，與其對明清社會流動的整體把握有很深關係。因此，在學習上先對《大明會典》、《大清會典事例》等典章的熟知，然後進入區域中國家制度的實施過程分析，會有較好的效果。

總之，以上議題和方法的啟示，是我十來天在研習營“鍍金”所得。在日後的研究生活中，我會將之結合到具體問題判研之中。感謝諸位授業老師，尤其是李孝悌老師、王鴻泰老師和諸位田野導師，日以夜繼的陪護、指導；感謝羅麗芳、王昭力等老師、張家豪等同學作為會務人員的照料。期待我們日後再聚！